

近 世 文 化 論 叢

# 陈寅恪 与 中国文化

刘克敌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陳應聘元後來校担任教授  
...名詩人  
...  
維趙元任三先生同任清華  
教授（本校王力院長亦出其  
清華教授廿餘年。中間有一  
由英國牛津大學聘為正教授，此至  
之榮譽，終以健康關係歸國。陳先生以史學  
馳名海內外，尤精於隋唐史；同時以家學淵  
源，又精於唐詩。且以精通梵文之故，又常  
講授佛典翻譯文學。其博學為學術界所公認  
。去年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陳先生榮  
膺院士之選。張純明教授為美國伊利諾大學  
博士，曾任南開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及政  
治學系主任七年。歷任行政院參事，世紀評  
論總編輯等職。曾任中央文史政治系教授。



近

世

文

化

论

丛

# 陈寅恪 与 中国文化

---

刘克敌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 卫  
封面装帧 陈红萍

近世文化论丛

**陈寅恪与中国文化**

刘克敌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75 插页 5 字数 180,000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ISBN7-208-03135-5/G·587

定价 18.00 元

谨以此书，献给陈寅恪先生

双目失明的俄底浦斯在走向神谕指明的神性境界。

——哈罗德·布鲁姆

伟大人物的著作是环绕我们升起、落下的太阳。一切正待再次升起的伟大著作，它们的时刻来临了。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2020

## 序

### 吴中杰

刘克敌是华东师范大学王铁仙教授的博士生，前年他的学位论文《陈寅恪与中国文化》提交答辩，铁仙兄邀我参加答辩委员会，使我得以较早阅读此文。披览之下，深被吸引。答辩会后，我即请克敌抽出一章，给我参与主编的学术丛刊《海上论丛》发表。因为稿件的来往，我们就熟悉起来了。我感到，他不但文章写得好，而且为人也好，踏实，诚恳，厚道。于是情不自禁地向铁仙兄夸赞起他的高足来了。最近，忽然接到铁仙兄的电话，说是克敌的博士论文马上就要出版了，嘱我作序，而且限期交卷。我虽然欣赏克敌的论文，但对于陈寅恪却缺乏研究，并非作序的适当人选，而铁仙兄不允我推辞，也只好勉为其难了。

陈寅恪是中国现代史学大师，但他的成就并不限于史学，而涉及整个文化领域。或者说，他是以史学为切入点，去研究中国的文化问题。因为他一向崇尚学术自由，坚守独立精神，不肯随俗俯仰，迎合潮流，故虽然学术成就极大，却长期备受冷落。近年来，由于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的变迁，陈寅恪

研究忽然成为文化界的热点。报刊上常见谈论陈寅恪的文章,出版社也出版了不少陈寅恪传记和纪念集,有些还成为畅销书,影响很大。这些著作,对我们了解陈寅恪的生平际遇和学术精神是很有好处的。但对于一个学者说来,更重要的还在于对他学术思想的研究,而目前所欠缺的却正是系统论述陈寅恪学术思想的著作。所以,刘克敌这本著作的出版,是值得欢迎的,它对推动陈寅恪研究和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都能起一种积极的作用。

本书从文化观、语言研究、历史研究、文学研究、治学原则和方法、诗歌创作等方面,系统地论述了陈寅恪的学术思想,而旨归于陈寅恪对于中国文化问题的思考,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因为在作者看来,陈寅恪的学术活动,是以语言研究为基石,以文化研究为主体,以对人类命运的关心为目的,从而建立起独特的学术思想体系。这样,作者的眼光就不能停留在陈寅恪本身,而必须扩大到整个文化领域。但陈寅恪的治学另有一个特点,他主张少批评他人的观点,多说自己的话,自觉地建立起自己的学术体系。这种缺乏对话的情景,使后来的研究者要寻找陈寅恪与周围的学术联系,就比较地困难。而具有文化使命感的学者,又决不会满足于撰写高头讲章,或者为考据而考据,他的学术观点总是有针对性的。克敌深入研究,终于发现了一种潜对话或间接对话的方式。这就是说,陈寅恪表面上自言自语,或者讲的是历史旧事,却都有现实的针对性。由此开掘下去,就能透视出他对现实文化运动的态度了。此外,本书在具体论述上的一些见解,也是值得读者注意的,如:关于陈寅恪对新文学的意见,关于陈寅恪对《红楼梦》的研究和其他红妆研究的关系的看法,关于陈寅恪的小说

研究与胡适、鲁迅此类研究的比较,关于陈寅恪的大历史研究的提法,关于陈寅恪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评述,关于陈寅恪的学术研究方法等。

由于对学术大师的景仰,研究者容易采取一种仰视的态度,以大师的是非为是非。这样就会挤压了自己的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产生偏颇。如果以这种态度来研究陈寅恪,首先就与他本人的学术精神相抵牾。克敌虽然还是学界新人,但他能保持独立评论的态度,力求作出客观的分析,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 目 录

- [1] 序
- [1] 引 言 卅载牛衣寒未暖,百年驹隙过如驰
- [11] 第一章 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  
——陈寅恪的文化观
- [12] 第一节 花落春仍在  
——传统的力量与价值
- [37] 第二节 取珠还椟  
——外来文化的输入与改造
- [55] 第二章 文字能教古器新,当年盛事久成陈  
——陈寅恪的语言研究
- [56] 第一节 言与道  
——语言变迁与民族精神
- [69] 第二节 “我们的母语,远胜于我们自己”

- [95] 第三章 人境高吟迹已陈,蒹葭墓草几回春  
——陈寅恪的历史研究
- [96] 第一节 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 [107] 第二节 历史不相信预言
- [135] 第四章 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  
——陈寅恪的文学研究
- [136] 第一节 了解之同情  
——文学批评观略论
- [154] 第二节 透过三棱镜的阳光  
——文体演变研究
- [199] 第五章 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  
——陈寅恪的治学原则与方法
- [200] 第一节 从何出发
- [208] 第二节 真理自己发现自己
- [233] 第六章 高楼冥想独徘徊,歌哭无端纸一堆  
——陈寅恪诗歌评析
- [234] 第一节 悲凉之雾,遍被华林
- [242] 第二节 枉抛心力画朝云
- [259] 主要参考书目
- [262] 后记

# 引言

卅载牛衣寒未暖，  
百年驹隙过如驰

中国的文人，一向对时光的流逝特别敏感。而把时间与水联系在一起，更能让人们对一去不返的人生感到迷惘与惆怅。大概从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始，历代诗文中对此就有了无数的咏叹，其中最出色者也许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和苏轼的《前赤壁赋》。其中透出的那种瞬间见永恒、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精神境界，确是中国文化的极致。作为一代文化大师的陈寅恪，其深邃的学识和特殊的经历，当使他对此有更深切的体验，亦才能写出被我们用作引言题目的诗句。陈寅恪的好友吴宓，看来也有类似的感受：

心迹平生付逝波，更从波上觅纹螺。

云烟境过皆同幻，文锦织成便不磨。

好梦难圆留碎影，慰情无计剩劳歌。

蚕丝蛛网将身隐，脱于一编任诋诃。<sup>①</sup>

人生的无奈与悲凉，看破结局的平淡与从容，在他们那一代人的笔下，总是如那东去的江水，永不停息地流淌。

对他们这种情感的认同，成为我写作此书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选择是困难和危险的——这是一个难度太大的题目。陈寅恪的世界是广阔的，平庸如我之辈即使能入其门也未必能觅宝而归。不过，我还是想尽力一试——无论如何，陈寅恪毕竟属于二十世纪，他的学术思想和成就以及他的高风亮节都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组成部

<sup>①</sup> 见《吴宓诗集》，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版。

分，继承这份遗产并对其进行必要的阐释，比起单单在情感上的认同，应该更有意义。

陈寅恪曾被人们认为是保守和不合时宜，即使在今天也还有人误解他，其中也包括那些赞扬他的人。而陈寅恪的学术思想又往往隐含于其烦琐、枯燥的考证之中，更让人们难以把握，这一切都增加了研究的难度。不过，二十世纪毕竟只有一个陈寅恪，如果我们该为这个即将走完的世纪写点什么，就不能忽视陈寅恪的存在。遗憾的是，这种忽视曾经有过，而那时是怎样一个时期人们也都很清楚。在中国经历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之后，如果我们还不能认识到陈寅恪的价值，那只能是一种悲哀。

那么，他究竟为我们留下了什么？

自然，他首先是一位渊博的学者，他在语言、历史、文学及宗教研究等领域所作出的贡献，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中外文化特性的理解、比较与把握，对中国文化命运与发展的展望，都是相当深刻且富有洞见的。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演变及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更为陈寅恪所关注，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了陈寅恪许多论断的准确与深刻。至于在多个具体的学术领域，陈寅恪更有不少具开创意义的成果，并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契机与启迪。也许，读了陈寅恪的著作，才会真正理解到什么是博大精深，也才会对自己的浅薄无知感到羞愧与恐慌。毫无疑问，梳理与论述陈寅恪在多个学术领域尤其是在语言文学领域所作出的贡献及意义，将是本书的主要组成部分。具体而言，我认为陈寅恪的学术研究从广义上讲，是一种大文化研究、大历史研究，是站在人类文化发展之高度进行的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

在陈寅恪之学术体系中,语言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它绝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是其全部学术思想的基石与出发点。过去人们常认为陈寅恪之所以有如此学术成就,就在于他掌握了多种语言。这种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但却并未触及到本质。在后面的论述中我们将会阐明:陈寅恪对于语言本质尤其是汉语特性的理解,对于语言在人类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对于语言与人类思维方式、与人类世界观及哲学发展的关系,其认识已达到形而上的层次,可以说他已把语言提升到哲学的高度。陈寅恪常说:“读书须先识字”<sup>①</sup>,这看似平常的话蕴涵着深刻的哲理。它当然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像小孩子那样的识字,而是要理解语言的内涵,理解语言本身所表现出的思想哲理和文化特征。有意思的是,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突出现象即是对语言的重视。一般认为,二十世纪初在西方哲学界发生了“语言的转向”,而转向之后的哲学被称为语言哲学。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就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有一句名言:“不弄清语言的意义即无资格讨论哲学”,这与陈寅恪的观点确有几分相似。

从语言出发,陈寅恪走向历史与文学。同时陈寅恪特别注意从语言角度研究宗教,这也许有两个理由:一是没有语言就没有宗教,而且语言的魔力在宗教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二是宗教的产生与发展直接制约着语言,这表现为既制约着作为传播工具的语言又直接影响不同语言体系之民族的心灵。至于文学中的历史与历史中的文学,更是陈寅恪得心应手的领

<sup>①</sup> 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引自《谈陈寅恪》一书。本书注释除注明者外,其出处详见书末的参考书目。

域，“诗史互证”等原则与方法的提出与应用即为优秀的例证。当然，在谈论历史与文学时，陈寅恪没有忘记宗教的影响，反之亦然。最后，陈寅恪将其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指向文化与与人，他试图说明人类文化的演变与发展规律，展示不同民族文化的互相影响与特点；他关注人类的命运，其中既包括普通人如妇女，也包括各类知识分子。陈寅恪的研究领域及其关系与其终极目的可以这样概括：因为人是唯一有思想、有语言的动物，要理解人就必然要从语言出发；因为人是生活于一定社会制度中又同时创造历史者，所以研究人必须放到特定社会制度和历史进程之中进行；因为文学与宗教都是因人类而产生并被人类利用、对人类心灵产生最深刻影响者，所以要理解人与文化及其关系首先要了解它们。以语言研究为基石，以文化研究为主体，以对人类命运的关注为目的，这就是陈寅恪全部研究活动的三个基本点，以此他建立起独特的学术思想体系。因此，陈寅恪的研究真正实现了文史哲的打通、历史与现实的打通。人是历史中的人，处于一定文化传统中的人，而文化也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生动具体的、富有历史感的文化。

为此，陈寅恪主张为学术而学术，主张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反对外来的、强加的束缚。坚持心灵之自由、独立之精神是他最根本的原则，“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sup>①</sup>。与王国维一样，他认为学无新旧之分，无中西之分，无有用无用之分，学术本身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在治学生涯中，他自觉地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提出多说自己的话，少批评他人的观点。可

<sup>①</sup>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112页。

6 惜他的一系列治学主张和具体研究方法,在过去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反而常常受到批判。对此本书将给予较多的关注。

■ 陈寅恪与中国文化

作为一代大师,生活于动荡的二十世纪,陈寅恪虽然置身书斋,却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对于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和文化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及其具体历史进程,陈寅恪有他自己的见解。但他对于人们往往把学术论争与政治斗争混为一谈颇为不满,所以很少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宁愿保持沉默。诚如他所说:“今日言之,徒遭流俗之讥笑。……亦只得任彼等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吾辈固不必,且无从与之较量也。”<sup>①</sup> 不过有时候,他也采取以历史来证现实、通过历史来谈现实的做法,间接、含蓄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例如他很少谈及新文化与新文学,对于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观点,他虽有不满,却不像吴宓等公开撰文论战,而是以大谈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他在研究某一历史人物或事件时,心目中是有一现实为参照物的,言古即为言今。此外,他的研究即使是进行繁琐的考证,也力求能发现义理即规律,看其是否对现实有借鉴作用,如此考证正如他所言,“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楼”<sup>②</sup>。我把陈寅恪对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态度、观点与反应称之为一种“潜对话”和“间接对话”,前者更多地仅表现为一种态度,或不置一辞,或婉而多讽;后者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巧妙的对话方式,即通过历史上的类似人物及事件间接表达自己对现实的观点。而且,陈寅恪即使说

① 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27页。

② 《与妹书》,《学衡》1922年第20期。



出自己的观点，也并不指望会得到回应，因为他清楚自己的不合时宜。所以他的方式只是一种不求对话的对话，所谓“春来草自青”是也，只求时间与历史会为他作证。然而他的这种言说方式依然得到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的关注，真正的对话事实上已经产生，但却没有公开化。双方这种微妙的态度背后，应该有许多发人深省的东西和耐人寻味的话题。当然，不能把陈寅恪所有的论著都视为是“间接对话”或“潜对话”，且何为有意为之，何为无意涉及，也不易证明。对此本书试图根据已有的材料如诗歌及他人的回忆等，给出比较明确的答案。

其实，对于文学变革，陈寅恪并不反对，他与新文学倡导者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都致力于建设现代中国文化。只是在具体方法和途径上有分歧。他的意见主要有两点：第一，他认为新文学的发展缺少独立性，受政治思想革命支配过多以致沦为政治运动的工具，表现出强烈的实用功利色彩。第二，由此导致在引进外来文化方面比较盲目，过于强调实用且失真过多，引进后的加工改造也不尽人意；同时对传统文化否定过多，特别是在语言方面。但陈寅恪并未把责任完全归之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且对他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得不如此的做法表示理解，这是他往往能够保持沉默的原因之一。不过，陈寅恪的深刻之处在于他由此去思考 and 追问，为何这种重实用轻虚理的主张极易得到赞同？为何在一个讲中庸的民族中却常常表现出激进？在如何接受和引进西方文化方面，我们的选择为何出现了偏差？

他为此找到两个根源。在近代是康有为的思想：“后来今文公羊之学，递演为改制疑古，流风所被，与近四十年间变幻